

比较政治研究的取法与初心

——《激情、记忆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译余

汪卫华

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是近代西洋舶来品。远的姑且不论,从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科在国内正式恢复建制以来,各种汉译经典与前沿译著就成为推动国内政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助力。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曾言:“研究比较政治,译书为先。”像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 Jr.)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阿尔蒙德和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达尔(Robert A. Dahl)的《现代政治分析》,这些译著堪称国内比较政治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影响了数代政治学人。尽管近年来,学界同仁对汉译政治学著作质量参差不齐、甚或错漏迭出的现状颇多抱怨,但谁也无法否定政治学译著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独特文本

相比市面上常见的引进教材、学术专著或研究文集,这本《激情、记忆与方

* 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 本文系根据笔者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三期“洞明书屋”新书交流会(2022年5月20日)上的讲解与问答内容修改完善而成,谨对学院团委和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基地王栋教授的邀请表示感谢。

法：《比较政治访谈录》无疑属于政治学行当里的“异类”经典——到目前为止，它仍是唯一一本以领军人物为中心，详尽反映当代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历程的巨著。^① 书中既有关于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脉络的长篇综述，更通过塑造这个研究领域基本样貌的15位当事人“现身说法”，展现了当代政治学巨匠们的学思历程。当然，类似文本也还有，比如，在每年一本的《政治学年度评论》上，近年每期都会有一两位资深学者的自传文章或采访记录，但无论篇幅还是详尽程度，那些文章显然都不像这本书记述得这么全面深入。15位被访对象，现如今已大半过世，所以本书也是弥足珍贵的学术口述史，记录了比较政治研究的黄金时代，读者念完，也就能对这个领域的大致发展轨迹有一个基本印象了。

本书另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无处不在的“方法论战”。大学里常见的研究方法教学，教科书也罢，核心文献也罢，基本上贯彻了“非人格化修辞”的要求，干瘪枯燥，味同嚼蜡。仿佛政治学研究方法就是程序员手头的连串代码，即便存在漏洞，只要照规矩修改一番、打好补丁，终归能让程序跑起来。

但这本访谈录非常清晰地传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关键信息——方法怎么样才能为研究服务？取决于人。这些比较政治大师，详细地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求学、研究经历，用切身体会明确地告诫我们：研究方法是手艺活，是帮助我们整理思想、分析现实的工具箱，而不是拿来削足适履、剪裁事实的障眼法，更不是“耍花枪”吓唬人。这些领军人物，各有其思维习惯和方法偏好，在政治学的科学属性、定性定量方法的取舍及写作习惯上，他们立场相去甚远，却又各自持之有故，生动地展现出社会科学研究“条条大路通罗马”。

抱定开放的心态，不拘泥于学术圈里此起彼伏的流行时尚，坚定地追求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清晰解释，在我看来，这些对于今天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们，是非常有启发的经验之谈。

此外，国内汗牛充栋的政治学译著，也包括期刊上发表的大量中文论著，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关键的学科术语、重要的理论表述，还需要加括号、注原文，否则，大家很可能就不知所云，或者读者看到的与作者想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在翻译引进外国作品的这许多年里，中国政治学人还没有做到基

^① [美]赫拉尔多·L. 芒克、理查德·斯奈德编著：《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汪卫华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版。

本的术语统一,这是源自西学的中国政治学尴尬所在。更麻烦的是,在政治学不同子领域工作的国内学人,往往对同一洋词有很不一样的理解和译名习惯,更不用说由此造成了许多学理上“顾名思义”“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遗憾。

这本访谈录涉及的年代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不同时期、不同学者,语言习惯很不一样,各自背后的理论脉络也大不相同。从英文频道转到中文频道,我希望通过本书的翻译工作,集中地把这些学科术语和理论方法名词系统整理一遍,既要最大限度地确保原文与译名意义一致,又想尽可能把不同原文表述之间的微妙差别在译文中体现出来。翻译西学著作,其实是一个学术上的消化过程。任何术语与它相关的其他术语、理论脉络微妙地联系在一起,在不同语义场里,基本无法做到严丝合缝。在英文语境里和中文语境里,就连“国家”“权力”这样的常用说法尚且不能做到一一对应,更遑论大量理论和方法术语上的微妙差异呢?如果连名词术语都不能做到言语一致,那么讲“中国的政治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两点心得

在翻译过程中,有关比较政治这个专业领域的两点切身体会逐渐清晰起来:

第一,教科书通常都会强调,“行为主义革命”对于当代政治学的科学化有着决定性意义。这本书也是把行为主义革命作为比较政治研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由此才出现了传统的“比较政府”向现代的“比较政治”转型。

但我的体会却是,仅就比较政治这个专业领域而言,其实从没有发生过“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革命是在“美国政治”这个专业领域之中发生的,是美国政治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本土化”之后的进一步更新升级。美国人不再从欧洲人的眼光、用欧洲人的思维习惯去审视政治问题,而开始用自己的眼光,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大量引入心理学、社会学的方法与理论,研究从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到镀金时代、再到进步时代美国政治现实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20世纪20、3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由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戈斯内尔(Harold F. Gosnell)、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领衔的“芝加哥学派”拉开帷幕,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短暂停顿,在战后破茧而

出、终成大潮——不过，这场思想革命的中心也从芝加哥大学转到耶鲁大学。

比较政治研究是在美国政治研究的影响下，通过政治学科之内的竞争，以及同时在美国政治、比较政治两个领域开展研究工作的具体人物，才逐步被动地受到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比如阿尔蒙德，他的学术训练根基是美国政治研究，属于“芝加哥学派”嫡系传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才转向比较政治研究。一方面，阿尔蒙德把行为主义的研究风尚带进比较政治；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主持筹建了社会科学理事会“比较政治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在有意识地模仿“政治行为委员会”的学术规划，塑造这个领域的未来。比较政治委员会在战后比较政治研究起步阶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再比如，达尔是战后行为主义革命的旗手，他也是在美国政治领域先确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成为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代言人。20 世纪 70 年代，达尔把自己基于美国政治研究得出的理论心得，延伸到比较政治领域，深刻影响了比较政治体制和民主问题的学术走向。相形之下，哈佛出身的亨廷顿显然对“行为主义革命”不那么感冒，但他的学术生涯同样是从美国政治研究起步的。

比较政治领域第一套主导“元理论”是结构功能主义。我们只要多琢磨一下，就不难发现，结构功能主义跟行为主义革命压根儿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频道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底色是持整体论立场的人类学，行为主义的底层思维是持个体论立场的心理学。阿尔蒙德一方面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比较政治体系大框架，另一方面又与维巴合作了行为主义色彩浓厚的《公民文化》。尤为有趣的是，《公民文化》的操作程式是行为主义的，概念框架又脱胎于韦伯式“理想型”。这种嫁接出来的理论风格，内在矛盾不是很明显吗？可是，这又的确是 比较政治研究起步阶段“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打地基的生动写照。

讲政治学学术史，人们通常都下意识地把行为主义革命当作比较政治的“里程碑”，这本访谈录的第二章长篇综述也是这么讲的。只要仔细地梳理比较政治学术发展脉络，我们很容易发现，行为主义革命只不过是 通过在两个研究领域工作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物，通过各大学政治系的研究方法教学，逐步从美国政治研究领域延伸影响到了比较政治研究罢了。通过翻译这本书，以及另外做的功课，我才大致弄清楚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没有美国政治研究的本土化，就没有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没有美国政治研究造就的理论与

方法趣味,以及“校园政治”的无形压力,比较政治不可能自主地出现行为主义转向。

第二个收获是,国别研究才是比较政治的基础。今天的政治学人通常会觉得,比较政治,顾名思义,就是得做两个以上国家的比较,最好是全球比较。但缺乏扎实地、具体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对各国国内政治做分析和讨论,只凭各种各样的二手数据集,借助复杂的定量模型,比较政治的故事只会讲得越来越玄。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如今似乎成了时髦。有些立足二手数据的跨国量化比较,貌似模型漂亮,结论却往往无非常识。这到底是“炫技”还是踏实的政治学研究呢?

没有扎实的国别研究,何谈比较政治? 15位受访对象有些原本就是美国政治专家,就像达尔和斯考切波,都在美国政治研究领域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亨廷顿就更不用说了,他对美国政治深层矛盾的许多看法极富预见性。而那些主要以别国政治为考察对象的学者,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起步阶段也都是通过国别研究入行的,再逐步扩充到跨国比较。比较,是扎实的国别研究基础之上的比较。通过跨国比较作出理论概括,也需要以扎实的国别知识为经验证据。比较政治研究,需要丰富的国别细节,不能把比较简化为跨国量化研究。弄清楚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如何开展是有启发的。

三、向谁学习

访谈录汇集了15位比较政治巨匠的学思历程,他们各擅胜场,都给予我很大启发。这里面大概有5位学者的作品,我在翻译本书之前从未念过。翻译过程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看他们写的东西,试图更精准地把握他们的立场和思路。译好学术著作,翻译之外下的自学功夫,往往得要比翻译工作本身更花时间。对比这15篇访谈,我的体会是,如果把他们的经验放在一块做些对照,各取所长,可能收获更大。

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贝茨(Robert H. Bates)、莱廷(David D. Laitin)以及科利尔(David Collier),这4位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下功夫比较多,而且他们的方法论著,现在仍然是研究生课程中都会布置的必读文献。但是,他们的方法论立场完全不同,对于定性、量化及形式建模,各有各的切身体会

和主观偏好。细读他们的学思历程,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会侧重某一类方法——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道理,与他们各自的训练背景、在处理的研究话题有着很大的关联。通过这4位对研究方法的讨论,读者可以清晰地体会到,从来没有什么最好的方法,只有最适合的方法。做研究工作,你自己的思维习惯如何,更擅长捕捉哪些信息、运用哪些分析工具,这些要素才决定了方法能不能够为你所用。

另外两对合作者的经验也很有意思——林茨(Juan J. Linz)和斯捷潘(Alfred Stepan),奥唐纳尔(Guillermo O'Donnell)和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这两对学者的合作无疑都很成功,乃至给比较政治设定了长远研究议程。林茨和斯捷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合作到21世纪初两人先后过世,深刻影响了民主化问题上的跨国比较研究。奥唐纳尔和施密特的合作时间没那么长,但相较于他们各自的研究课题,两人合作的那本薄薄的小册子,无疑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整体走向。这四位学者又都在各自扎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推动塑造了跨国比较的重大议程。细读他们的工作成果与自我解读,读者能够从他们的合作经验、讨论经历以及写作实践中受到有益启发。怎么样选题,怎么样做事,怎么样修改,怎么样合作,我觉得,从这两对学者身上,后辈学人可以发掘出许多切实的经验。合作研究,不是把两个人的观点单纯地拢在一块儿,更不是简单的研究方法分工,而是要通过合作过程相互影响、相互发明,进而形成统一的、连贯的研究结论,让人耳目一新。

从这本访谈录里,读者很容易发现,拉美研究是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理论发展的“富矿”。当然,每位学者自身经历不同,像奥唐纳尔,原本就来自拉美,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外人”在机缘巧合之下,跑到那儿,发现了新鲜事,或者碰到了重大事变,觉得有意思,然后就开始做相关的研究。20世纪60至90年代,比较政治领域的理论进展,大半与拉美研究联系在一起。而且,不仅是理论结论,在研究方法上,拉美研究都对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这些学者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从区域国别研究起步,对推动理论发展,贡献是实实在在的。拉美对于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而言,显然是“近水楼台”,那是必须要搞清楚“后院”,是利益攸关的重点地域。尽管这些学者出于不同的个人因由被吸引到拉美,并就此得出了重要的理论发现,但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

格局,无疑潜在地牵引着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眼光。那么,对于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来说,是不是也应当好好考虑一下,除了盯着欧美大国之外,有没有某个关键的对象区域——比如东南亚、南亚、中亚——是我们应该花心思好好弄清楚的呢?

这本访谈录里,有一位受访对象似乎在当下国内知识分子中“人气”甚旺,在政治学以外的读书人里大概也是知名度最高的——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确,读其夫子自道,不少向往自由自在、国家退场的知识分子不但会觉得他经历传奇(其实在我看来,斯科特的经历远比不上斯捷潘或奥唐纳尔传奇),更会赞赏他如何实践了“弱者的抵抗”。前一阵子,互联网上流传了一些有关斯科特年轻时候的“灰色经历”。实际上,那些事情对于老一代做外国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来说,恐怕是很正常不过的了。在我看来,或许应该提醒读者的是,斯科特是一位接受过严格的传统古典文法教育、亲近人类学的政治学家。这样独特的教育背景和研究经验,恰恰是这15位学者中最难以被复制的。作为政治学家,斯科特恐怕是天才型的异类人物。倘若一个政治学专业的年轻人,想按照斯科特的路子去走,那么,此前花的功夫够不够?能不能对日常生活的保持敏感?在此基础之上,能不能提炼出来有启发性的新观点?这些大概才是最难以通过学院式研究生训练培养出来的本事。更吊诡的或许是,倘若把斯科特的立场贯彻到底,那政治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们当然需要对斯科特的研究抱定高度欣赏的态度,但如果硬要学他的做法,窃以为不但最难学成,更有极大的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四、学科样态

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有两个关键的转折点:一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传统的“比较政府”,转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追求一般性理论解释为目的的“比较政治”。今天的比较政治研究,显然是理论导向的——试图把各国的国内政治现象,放在一个相对一致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解释,对于世界上这些个或那些个同类的事情,给出的一套因果清晰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组织方式、思维习惯,让比较政治研究跟传统上“公法时代”的那些比较政府研究完全不一样了。这是第一次大转向。

第二次大转向,以1994年金(Gary King)、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维巴的《设计社会调研》^①出版为标志,从此之后,因果推断的“行规”似乎已经敲定了。尽管后面这20来年,大家一直在争论:能不能那么简单地拿量化的标准去框政治学研究?大家的看法显然不一致。当然,尽管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但从这本“布道书”之后,美国政治学的“主流”方法论偏好的确是已经定下来了。在这个大前提下,人们可以进行不同方法论立场的辩论,但首先必须要承认这一套方法论话语,也就是强调推动政治学的进一步“科学化”,或者所谓“因果推断革命”。

这样两次转向,背后的触发因素、转向动力,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

为什么会有从比较政府向比较政治的转向?说白了,就是为了加强对外部世界,尤其是亚非拉的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秩序主导国家,更面临着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它如何在亚非拉地区扩大影响,跟社会主义阵营争夺这些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解放出来的新国家,把西方的主导价值观和政治观念传播到全世界,这是战后比较政治研究很现实的触发因素。

如果对照回顾一下1960年北大政治系的重建,特别是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设立,此事背后的初始动因,与战后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起步很相近——新中国要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尤其是亚非拉地区的情况。当然,其中也有一定的理论关切,但现实需求更为强烈。我们使用了“国际政治”这个名目,字面上容易引起误解,换到英文频道,国际政治跟国际关系是一回事,但实际上,从研究对象来说,新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创设国际政治专业,都是希望增进对于以亚非拉为重点的外部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摸清基本事实,弄清楚前因后果,搞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情。政治学界时常讲,比较政治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但如果不在意这个名头到底叫什么,新中国对于类似问题的研究,起步显然并不晚。至少,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中央文件和三所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建立来看,

^① 《设计社会调研》(*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行内俗称KKV)。国内常见的中译本书名改译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本人不大赞成这一译法。一方面,任何翻译(translation)都潜在地意味着新诠(reinterpretation),学术著作似以尽可能照本直译为佳,以免无意间塞进译者的若干看法;另一方面,这本“布道书”,专论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断”规矩,并不着眼于研究设计的整个流程,更不是一本操作手册(社会科学各领域这种操作手册着实不少)。

新中国有系统的比较政治研究那时已悄然展开了。

当然,从大学象牙塔里的学科、专业设置角度讲,政治学科的恢复,国内学界公认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自那以后,国内政治学人更为系统地引进了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若干比较政治理论成果、研究方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似乎特别看重它的理论框架、抽象结论。这种局面,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氛围和知识氛围显然是相呼应的——政治学有着强烈的现代化愿景和体制改革现实关切,期待从这些“前沿”研究中学到规律、为我所用。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起始点与动力上讲,中国与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的确很不一样,又未必那么不同。学术事业毕竟是人干的事情,不同国度处境不同、焦点不一,注意力当然会有所差别。但在中国的政治学科恢复后,引入英语学界比较政治知识的进程中,我们是否无意间忽略了“其所由来”,过分看重其作为“科学理论”的一面了呢?

迄今为止,政治学科在国内重建已历40余年,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过于在意理论引进的状况,似乎还没有明显变化,不是由事实关切主导的,而是由理论兴趣主导的。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外交流更加频繁,互联网时代跟踪学术信息也更加便利,美国政治学界从《设计社会调研》之后确立的方法主导趋向,也很快辐射到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最近这10多年来,方法上跟风,也逐渐变成了时髦。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引进、消化、吸收”的阶段当然还没走完,“照葫芦画瓢”的事又越来越多,客观上也令我们的比较政治研究不太容易坚定地往务实方向走,反而往玄虚的、过于侧重一般性理论的方向去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的比较政治教科书也罢、培养方式也罢,方法和理论主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比较政治研究到底采取方法导向,还是采取国别导向,二者之间显然存在某种张力,不能笼统地说谁对谁错。不过,在我看来,对照这本访谈录贡献的生动治学经验,中国自身的比较政治研究,恐怕还是不要太着急走到那种只谈理论、方法导向的路子上为好。先认真地把一些国别导向的事情做好,国别导向为主、方法导向为辅,可能更适合于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自己的比较政治“学科建设”。

把国别和方法相结合,是推动比较政治研究的关键点,这显然不等于一味地强调追求“科学”。这本访谈录能够帮助我们祛魅——这些比较政治巨匠在

做研究的时候,脑子里哪有那么些科学不科学的条条框框?他们就是要回答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给出带有实际意义的、漂亮的、清晰的、具有理论意味的回答。这才是政治学走向科学化的初心,这个初心,我觉得不应当忘记。

学术圈也是“江湖”,科学化的政治学不培养政治家,但政治学系里一样充斥着校园政治。访谈录里每位比较政治大师的学术际遇不尽相同,但不难发现,在其求学和研究生涯中,几乎每个人都一方面强调了“无形的学院”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出发,对不同时代美国大学里的校园潜规则“大吐其槽”。无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还是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大学,每所大学其实都有自己的校园文化与学术派系,哪有那么些清晰明了、普遍适用的世界一流大学“先进经验”?相反,面对21世纪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状,这些大师们或隐或现地表达得更多的,恰恰是对政治学科碎片化、平庸化的忧虑,而不是对前沿进展的乐观信心。

大学里的政治学研究,科系设置、课程安排、教师背景以及学术界的流动性,恐怕没有某些管理专家宣扬的那么有固定规律。不同大学尚且如此,更何况不同的国家?不同国度,社会科学教育有各自特殊的发展轨迹和不同使命,美国大学“校园政治”造就的各种风气与惯例,未必就意味着“先进”,日本和欧陆大学的规矩,也未必就那么“落后”。大学是有机体,有它自己的成长脉络,没必要特别强调这套做法特别科学,或者那套经验特别先进。更何况,比较政治研究这个领域的进展,绝非纯然是“象牙塔”里造就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反倒是世界格局、现实时势使然。如果美国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世界性的影响力,恐怕也没有那么多的兴趣去了解这个世界。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欧洲知识分子由于各种原因流亡到美国,影响了美国的思想界,“政治科学”也未必会走成今天的样貌。政治学的发展,有许多机缘巧合的要素,很难说有某套先进的教育体制天然地就适应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大学也好、学科也好、教育也好,或许还是应该因地制宜,明确自己的问题意识,去寻找更为妥当的解决办法。

五、哪些素质

比较政治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归纳这些前辈学人的研究心得,大致

有四个方面：

第一，需要好奇心。这本访谈录把“激情”置于首位，有激情，研究者才有内在动力，好奇心就是解决激情和动力从哪来、起步点在哪儿的问题。对入门者而言，好奇心和激情搁在一起，可能才是这本书要传达的重要信息。倘若把比较政治研究就当成个职业饭碗，就当作完成“关键业绩指标”(KPI)，那么只会越做越无聊。比较政治也罢、国际政治也罢，目下国内绝大多数研究生最大的困惑并非学业条件不好——无论接触文献、搜集信息的便利程度，还是与国外学人进行交流的便利程度，今天跟十几二十年前完全是两个世界了，机会很多。关键的问题是，大家的好奇心越磨越少，研究激情严重不足。

研究生的学业动力不明确，恐怕是当下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有没有弄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念研究生？到底要做比较政治还是国际关系，自己先得闹明白。如果仅仅指望“逃避走向社会”，姑且把就业的事搁一边去，或者就想挣个容易弄到的学历文凭，那是在另外一个频道上讲话，与我们带着明确的研究志趣去回答那些学理上与现实中的大问题是两码事。修辞立其诚，不感兴趣，恐怕就得考虑是否有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必要了。

第二，打牢政治学的基本功。要做好比较政治研究，要提升自己的判断力，掌握政治学里那些最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很有必要。不要那么在意规范理论和实证理论之间的差别，不要那么在意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差别，政治学的“根”，是讨论那些重大的、带有规范性关切的现实问题。政治学“科学化”只是很晚进的事，到现在也无非七八十年的时间。政治学的大问题、根子上的问题，回避不了价值观立场，回避不了规范性关切。基本功得打牢，基本概念得清楚，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更恰当地去捕捉现实问题，弄清到底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花力气探索的。

特别需要自省的是，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对于中国人而言，迄今为止还主要是西洋舶来品。论政治经验，中国人的政治实践传统和政治思想，恐怕要比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体系丰富得多，积攒下来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好好地加以整理。中西并举，可能是需要我们去下功夫突破的事情。无论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典章制度，还是那些具体的历代政治实践，都需要我们理清楚、闹明白、比一比。借用甘阳教授的说法，“通三统”，我们的政治学知识生产恐怕也需要去“通三统”，把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学说、中国政治实践经验与西方政

治学理有机结合。不是说西方人拿英文写的文献就是对的,就是前沿,或者就是先进的。不同时空处境,不同文明积淀,不同思想脉络,总之,对不同国家政治实践经验积淀下来的东西,需要多一些更加自主的关切。唯其如此,才称得上更为全面的比较政治研究,而不是拘泥于西方政治学给出的针头线脑、划定的条条框框亦步亦趋。

第三,方法上的训练。当下的政治学界已经有了明确共识:我们必须要有研究方法,必须要有一些定性的或定量的方法工具,帮助我们更有效率地去完成研究计划。但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方法上最大的软肋,恐怕并不是量化技术。只要花点时间精力,掌握量化技术不是什么大问题。相形之下,学习外语的障碍,可能要比量化技术上的还多些。但这二者都不是根本性的麻烦。方法训练中最大的困扰在于认识论、知识论,许多人并不清楚,为什么今天这样一套政治学知识的组织方式、因果关系的讨论,会呈现出这副模样。其实,花些时间了解一下西方分析哲学传统,尤其是逻辑经验论出现之后,整个科学知识的组织方式是怎么成型的,很容易弄明白西方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个中机巧。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众多行规,都是由逻辑经验论基础上的科学哲学“标准观点”奠基的。今天的政治学研究,如果放松所谓实证经验研究的束缚,从反思的角度、从后现代的视角,或者从各式建构论视角来看问题,大家也不难理解欧美政治学为什么会日趋多样化。

思维方式、逻辑传统上的许多东西,决定了政治学研究的认识论根基,但这些东西往往又是方法论教科书上读不到的,因为它们原本就是西方文明思维习惯的组成部分,又恰恰不是我们的思想传统中固有的东西。中文语境中的思维方式,跟西方语言系统下的思维方式,底层逻辑很不一样。对于中国政治学人来说,恐怕就得有意识地去补充、琢磨这方面的认识论根基,才能更清晰地、更准确地把握研究方法到底是什么、用来干什么,而不是故作高深,把方法弄成拿来吓唬人的东西。方法训练,归根结底,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清晰化,这需要我们在认识论上保持清醒。

第四,历史的眼光。在研究具体问题之前,需要对其历史经纬有清晰了解,而不是胡乱地“套理论”。因果解释,需要在处境特异性与理论一般性之间求取平衡。要理解处境的特异性或特殊性,就研究政治现象而言,历史的眼光很重要。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得返回去讲历史,这并非社会科学工作的

主业,而是要带着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对时代背景、演变脉络、发展进程有明确的把握。对于比较政治研究,历史细节往往意味着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信息。

如果眼前只是看到各式各样的数据,只想通过量化模型,把数据里的模式、规律给“逼”出来,然后就说自己做出了创新性的甚至开创性的工作,这恐怕不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合适做法。社会科学处理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与自然科学毕竟不一样。时代的束缚、历史的痕迹、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变化,这些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加以考虑的。

六、政治学是一体的

翻译这本访谈录,让我更加坚定地认识到,没有什么独立的比较政治学科,只有作为一套知识整体的政治学。此后,在另一本经典教材《比较政治中的议题与方法》的译后记中,我再次重申了这一看法。除非出于中文表述上简练的需要,用以指涉比较政治这个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我才会使用“比较政治学”的讲法;其余情况下,我都坚持说“比较政治”或者“比较政治研究”。

政治学是一体的。不论是做国内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还是不要“画地为牢”为好。只学这个、不学那个,只知其一、不及其余,这种态度无助于政治学的发展。比较政治研究,没有办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本国政治研究切割开,甚至没有必要与规范性政治理论划清界限,这是我从这本访谈录里收获的基本认识。我们研习的是政治学,“比较政治学”这个标签,或许可以,也应当,逐步淡化了。